

# 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

——论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

〔日〕十时严周·

## 一、现代化理论：终极范型与进程分析范型

自从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建立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是人们研究的课题。社会科学的萌芽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经济学领域的亚当·斯密（1723~1790）、社会学领域的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和人类学领域的E·B·泰勒（1823~1917）。当时，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使西方社会完全卷入了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在西方，社会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变动的激流中应运而生的。西方社会科学从形成时期起就具有建立“理想”社会的强烈的哲理意向。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它的宗旨正在于探索如何使“理想”的近代社会变为全球的现实。因此，可以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对社会的现代化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早期的社会科学是在经典的社会变动理论的框架内形成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现代化理论旨在从中世纪共同体中“解放个人”，他的理论核心在于描绘理想的市民社会。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理论核心也在于从自然与社会的制约中解放人类，他追求的是摆脱了所有桎梏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大约100年以前人们提出的现代化设想，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相继变为现实。它主要表现为技术领域工业化的实现，经济领域中高速增长的实现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文化领域中个人自由的确立。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出现100年以后，现代化理论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对现代化理论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当时，许多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重新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目的在于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的“理想”的发展方向。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实现的“理想”的社会终极范型是60年代现代化理论反复争论的焦点。一旦确立了社会的发展目标，下一步就要研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术和战略。如何将第三世界国家引上工业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的道路，是这一时期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代表学者主要有R·N·贝拉（1927~ ）、N·J·斯梅尔瑟（1930~ ）和S·N·艾森斯塔德（1913~ ）。

贝拉原为思想史学者。贝拉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成长一样，都将不断走向成熟。他经常援用马斯洛（1908~1970）的人格发展理论来研究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化最为重要的目标在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智能水平，即提高信息的生产和处理能力，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sup>①</sup>

\* 作者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本文系作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邀请，于1988年10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日文稿由日本弘前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田中重好整理。

① Bellah, R.(ed)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Epilogue, 1965.

社会学家N·斯梅尔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要提高社会的适应能力,就必须具备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和社会重新整合这两个作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专业化和分化趋势,社会的专业化将提高社会的适应能力。但是,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如缺乏重新整合的力量,就将陷入失范状态。N·斯梅尔瑟也认为,社会从分化到重新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社会动乱。因此,要实现社会发展,就必须使社会的专业化、社会的重新整合以及消化处理社会动乱这三个社会过程有机地协调起来。N·斯梅尔瑟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妥善处理上述三种力量的相互关系。<sup>①</sup>

第三种现代化理论是S·N·艾森斯塔德的理论。他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说,要使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引导社会从稳定状态向“理想”的方向转变。在第三世界,引导社会变动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权力,一旦发生社会变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动乱。放任社会动乱将阻碍社会发展,于是,把这种社会动乱控制在最小范围则成了政治权力的重要功能。政治在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艾森斯塔德由此下结论说: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优先发展政治。<sup>②</sup>

综上所述,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有如下重要特征:首先,承认存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终极目标是这些现代化理论流派的共同理论前提。学者们认为,如同人从孩提时代长大成人一样,社会也必然经过成长和发展的阶段。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根据是,人的成长方式是不受时代和环境制约的普遍规律。因此,可以先验地断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最终都将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这表明人类“成长”的类型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共通阶段理论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前提。其次,在实现社会既定目标的手段和技术这一问题上,现代化理论诸流派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普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通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

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些现代化理论时,发现它们存在着下述一些缺陷:首先,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视为永恒的、超越历史的“事实”。然而,当我们详细地探讨这些所谓的属于超越历史范畴的观念和概念时,就会发现很难把这些观念和概念规定为“超历史的”。其实,被断定为“超历史的”所谓人类的普遍发展规律正是在西方近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近代以后,西方社会无疑成了世界中心。这一事实与将近代西方的观念、概念视为“超历史的”主张密切相关。具体讲,“超历史的”观念来源于构成西方社会科学基点的“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全人类将沿着同一途径向某一终极目标进化,这一进化的终点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这种思考方法同样也反映在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化理论的起点,重新研究一下是否所有社会发展的终点只有一个?现代化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将工业发展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战术。始于1760年的工业化的历史,1960年以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今天,如果我们不考虑全球的生态平衡,已经无法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说,60年代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所发出的警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该报告指出,如果迄今为止的这种工业化进程持续下去,那么地球自身将面临毁灭的危险。我们必须记住,并非象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所说的那样,工业化会在所有方面为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产物。现代化理论的第三个缺陷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只

① Smelser, N. J.: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in Smelser, N. J.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1968.

② Eisenstadt, S. N.: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1965.

有一种形式，所有国家都将超越时代的制约走英国产业革命以后现代化过程的老路。这个假设是违背事实的。我们不能断定英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全球的普遍规律。而认为各个国家都将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观点，更符合今天的现实。

## 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看比较现代化理论

下面，我们暂且抛开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所谓“超历史性”问题和“共通发展阶段论”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具体研究一下现代化的过程。这种新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H·u·威勒（Wehler）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学》一书中。<sup>①</sup>

威勒从两个方面对现代化的概念作了说明。他首先依据世界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对现代化的概念作了定义。威勒认为，在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这三次革命发生以后，世界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根据这一观点，威勒给现代化概念作了如下界定：“现代化是始于西方、继而席卷全世界的、划时代的、长期的、时常采用暴力形式的一系列变动”。现代化过程既是席卷整个世界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对各个社会都产生了重要意义的社会过程。由于各个社会都卷入了现代化这一激流之中，因此它们将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用威勒的话说就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各个社会将遇到“种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对应这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但是对应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各个社会都将采取彼此不同的对策，这是不言而喻的。

威勒给现代化概念下的第二个定义是：现代化是在18世纪60年代以后席卷全球的、以暴力形式出现的、长期的社会变动中，各个社会对应和解决因社会变动而产生的种种问题的过程。换言之，对任何社会来说，现代化都是新问题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其中，晚些时候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即后发现代化社会的变动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即它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使本国的历史传统结构、本国原有的内部矛盾与外来的观念和技术的的作用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一方面将面临同一问题，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例如，日本和中国在19世纪中叶同时遇到了西方列强军事力量的挑战，也就是说，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称霸世界的威胁。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上，日本与中国却非常不同，并且导致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

威勒在给现代化概念作了上述二个定义之后，提出要建立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现代化检索学”。这个“现代化检索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何种问题的“问题类型学”，二是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的“问题解决方式类型学”。不断地积累这一研究，最终一定会将所有的现代化范型都构筑出来。建立“现代化检索学”的提案不仅有利于研究具体的现代化过程，而且能够通过学科的体系化，使“什么是现代化”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得到历史性的回答。

在开展这项研究时，我们有必要把现代化作一下分类。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划分为内发型和外发型。内发型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发型现代化。外发型又可以再细分为两种，即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现代化国家和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运用这种现代化的类型划分。

我们在研究比较现代化理论时，必须摆脱现代化等同于“理想状态”的理论模式。比较

<sup>①</sup> Wehler·Hans—Ulrich: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Geschichte,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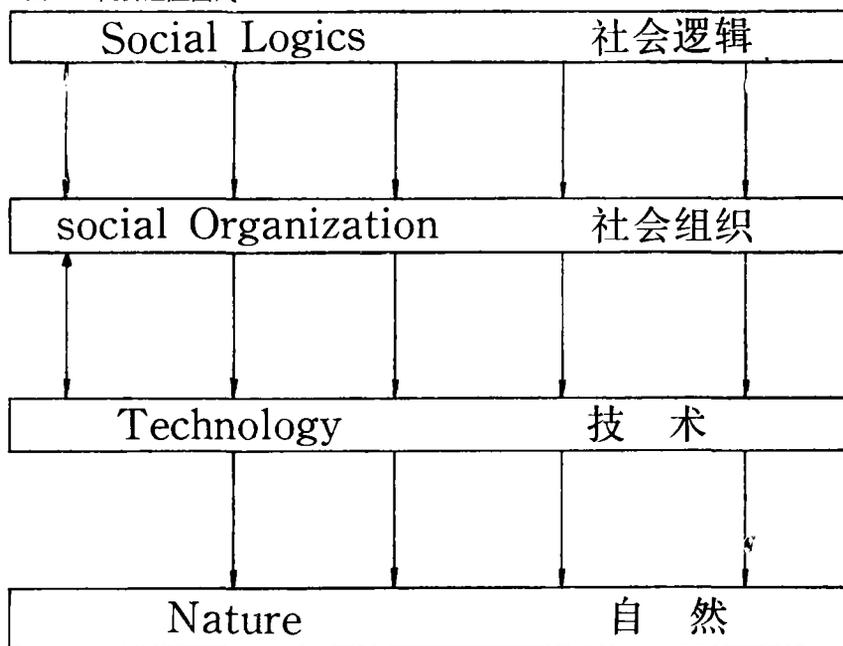
现代化理论首先应该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中各个国家具体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比较现代化研究实质上是比较社会变动的研究。

### 三、世界体系中的社会变动图式与比较社会变动理论

在研究社会变动时，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考虑极为重要，必须分析社会整体的变动过程。也就是说，必须采用宏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威勒把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史 (sozialgeschichte) 的研究。但是，这种社会史与法国年鉴学派 (Ecole des Annales) 研究的社会史不同。年鉴学派研究的社会史是一种微观的历史，它主要研究庶民史和地域史，而不是历史资料卷帙浩繁的政治史等一般通史。与此相反，威勒给社会史下的定义是：所谓社会史，是“局限在一定的社会范围 (国家社会) 之中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精神诸现象的历史”。换言之，社会史是在国际关系的变动过程中展开的包括技术史、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思想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历史。

那么，如何才能分析整个社会的变动呢？W·L·沃纳 (Warner) 的社会适应图式理论是早期社会变动研究的重要成果。<sup>①</sup>沃纳是社会人类学家，他曾经运用调查澳大利亚阿波里基尼地区土著居民的方法来研究美国的地方城市。他当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分析框架 (见图 1)。

图 1 社会适应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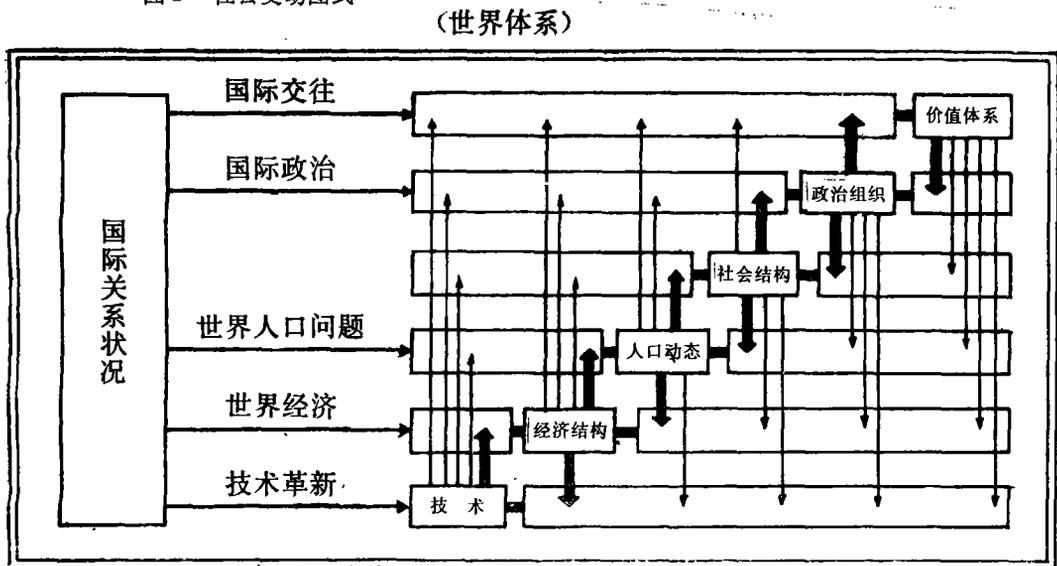
对于这个社会适应图式理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人类必须在地球上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人类依靠技术力量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生存所需的财物和服务。为了运用这些技术，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而要使社会组织不间断地发挥作用，又必须有“社会逻辑”的支持。有了这种保证，社会组织才能稳定地发挥其功能。技术的变化是经常性的。某一特定的优秀人物发明的某项全新技术会带来技术体系的巨大变化。随着与其他文化体系交流的深

<sup>①</sup> Warner, W.L., Lunt, P.S.,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入，也可能从外部引进新的技术体系。技术体系的变化将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变动有时是突发的，有时则是长期的和渐进的。任何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动都将导致社会逻辑的变化。一般性社会观念很少在短时期内变化。但是，一旦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社会逻辑中期或长期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动是艰难的。由于社会逻辑变化的艰难，传统的观念往往起着阻碍社会变化的作用。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时甚至去阻止某项技术的引进。也就是说，传统力量的作用方向是阻碍社会变化，这种作用力在图1中用向下的箭头表示。但是，技术革新出现以后，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作用力用向上的箭头表示。我们把向下的箭头叫作原有制约力，把向上的箭头叫作技术冲击力。沃纳的这个图式是1941年发表的，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以适用于当今现代社会的变动。

关于始于18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研究，存在着技术主导论和观念主导论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技术主导论认为，技术革新是使社会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凡勃伦(T·Veblen 1857~1929)、奥格本(W·F·Ogburn 1886~1959)和维特福格(K·A·Wittfogel 1896~ )。而观念主导论则认为，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传统观念将主导这个社会变动的方向，马克思·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属于此列。实际上，技术主导理论和观念主导理论都仅仅阐述了变动过程的某一侧面。我们必须将二者的观点统一起来。我们有必要按照社会变动图式(见图2)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变动。<sup>①</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的冲击力与原有制约力二者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处于何种关系，这是分析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线索。

图2 社会变动图式



这个社会变动图式没有先验地假定究竟是技术占主导还是观念占主导，它有待于经验性的探讨。一些关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表明，在传统农业社会，观念的作用超出了技术冲击力的作用，而在近代工业社会，技术冲击力的作用则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一旦引进了技术，社会的各个侧面都将在技术冲击力的作用下或急或缓地开始变化。技术冲击力首先直接地、集中地作用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人口的变化。这里的

<sup>①</sup> 参照拙作《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文化动态》，《法学研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第36卷4号，1963年。《社会变动与经济协力》，《法学研究》第48卷11号，1975年。

人口变化不仅指人口在数量上的增多，而且包含着人口的地区流动和职业流动。人口动态的变化将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变动。政治组织有时会对这些变动起加速作用，有时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系列社会变动影响着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在一代人到两代人之间将发生巨大变化，这种传统的价值体系同时制约着社会变动或引导着社会变动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把握技术冲击力与原有制约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极其重要。

#### 四、日本现代化进程分析

这里，我们略去对日本现代化进程各个阶段的具体分析，着重论述研究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方法问题。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应当从对原有社会状况的分析入手，着重研究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日本的风土。日本列岛的自然条件对日本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第二个要素是日本传统的水田灌溉耕作技术。笔者虽然对K·A·维特福格的环境决定论持批判态度，但仍然认为水田灌溉耕作对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要素是土地制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以后的地租制度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总之，从自然条件、技术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要素来阐明日本社会的原有状态，是研究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

在搞清日本社会内部原有状态的基础上，还要考虑日本被卷入现代化激流时期的世界历史环境。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开始时的世界环境、日本开始现代化建设时的环境以及中国受到现代化浪潮冲击时的世界环境都彼此不同。这种世界历史环境的差异，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日本现代化的进程，笔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分为5个时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为7个时期，具体划分如下：

##### 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时期划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

- 第1期（1858—1877） 引进西方技术时期
- 第2期（1878—1896） 发育西方技术时期
- 第3期（1897—1911） 日本产业革命时期
- 第4期（1912—1935） 财阀企业发展时期
- 第5期（1936—1945） 重工业、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 第1期（1945—1950） 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基础产业
- 第2期（1951—1955） 重工业体系的确立：设备投资热
- 第3期（1956—1960） 重化学工业化：产业结构的成熟
- 第4期（1961—1970） 高速增长政策：结构变动的加快
- 第5期（1970—1972） 成熟产业社会的实现
- 第6期（1973—1980） 低速增长时代
- 第7期（1981— ） 输出主导型经济、经济摩擦时代

时期划分标准主要依据技术的引进和技术革新等技术领域的变化。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与经济领域的变化是促进整个社会发生变化的主导力量。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社会变动图式”来对各个时期的具体内容作具体阐述。

在考察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在研究日本现代化某一时期的发展时，必须首先弄清前一时期的社会状态。因为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都是下一阶段发展变化的起点。第二，必须深入分析日本各个时期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动过程。在技术领域，不能忽视技术革新的世界性。在经济领域，要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研究日本社会的经济变动，因为今天的经济是“没有国界的经济”。而且，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及其缓和将以各种方式影响各个社会的变动。此外，随着国际交往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与此相关联的技术革新的动向和交流的内含正在左右着各个社会的变动状态。在对各个侧面加以分析之后，还必须找出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特征并加以分类。前一阶段的研究和这一阶段的研究均需利用各种统计资料。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没有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时期的详细分析，就不成其为日本现代化的研究。在研究日本的现代化时，应当运用威勒提出的问题类型学和对策类型学。

在完成了上述研究之后，下一步就需要对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在比较美国和日本近年来的社会变动时，就出现了所谓“后工业社会”的争论。<sup>①</sup>日本与美国近年来的社会变动方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探讨一下两国在同一技术的冲击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反应的原因是什么？产生这一差异的关键就在于各个社会的原有制约要素。美国的原有制约力量孕育了其独特的后工业社会。可以断定，美国后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状态不会以同样的形式在日本社会中出现。日本的高度产业化社会产生了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形态。日美两国的共通点仅限于经济与技术的某些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说，笔者不能赞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者特别是信奉帕森斯理论的学者的观点。帕森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诸类型》一书中主张，社会越是发展，社会系统化这一规律越会得到人们的承认。<sup>②</sup>按照这一观点，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或迟或早地将呈现出同样的结构功能，这种既定的社会状态可以用十几个命题来表述。<sup>③</sup>然而，帕森斯用这个命题来定义的社会状况并不能解释各个社会具体的变化方式。这里需要考虑的是，究竟是研究工业化的既定终极范型重要，还是详细研究尚未确定发展方向的、仍处于不固定状态下的社会的各种过程重要。笔者认为，与其多方面推测社会变动的终点，通过实证数据来研究社会现在的变化途径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因为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日本、美国和中国将发展为同一性质和同一形态的社会。

## 五、日本和中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本节将围绕最近出版的马家俊、汤重南合著的《日中现代化比较》一书，<sup>④</sup>阐述一下笔者对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看法。

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历史前提，而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就是工业化。当工业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将出现一系列变化：在政治方面，将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社会生活方面，将实现个人的自主与自由；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作为工业化带来的政治性影响，民族将

①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1973.

② Parsons, T.,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966.

③ 富永健一：《社会变动的理论》，1965年。

④ 马家俊、汤重南合著《日中现代化比较》，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

获得彻底独立。

但是，工业化是否能够导致这些结果的产生呢？笔者认为，没有知识水平的提高，就不会有工业化的发展；在个人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和自由的社会，工业化也不会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工业化与其他各种变化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让我们回到《日中现代化比较》一书提出的问题上。在分析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时，马、汤两位作者将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区分开来加以考虑。从外在条件看，两国都是为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侵略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而同属于外发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日本的现代化则以1858年日美通商条约签字为标志的安政开国为起点。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日本在开国后第16年就推翻了德川幕府，而中国在鸦片战争72年以后才推翻了满清政府。这一时间差距就是日本和中国现代化的差异。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从5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是商品经济水平问题。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变化。在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商品经济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在某些特定的产品和地区，中国商品经济的水平甚至超过日本。但是，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日本商品经济的水平则领先于中国。在中国，一部分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的内陆地区处于截然分离的状态。与此相比，日本则因交通系统的发达而使全国的商品经济水平有了相对较高的发展。换言之，日本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道路、港湾、船舶等基础设施以及货币、汇兑和商品交易条例已经得以完善。第二是土地所有制度问题。中国在封建制度下形成了地主制并允许土地的买卖。因此，农民和商人一旦积蓄起钱财便收买土地，成为士大夫地主或恶霸地主。在日本，土地实行领主地主制，土地没有成为买卖的对象。两国在土地所有制度上的差异与两国在政治革命和改革中的差异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在社会流动受到了阻碍的状态下，当日本的商品经济在德川300年间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后，便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改革。与此不同，中国在封建时代长期允许土地买卖，因此，即使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人们仍然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它起到了延续中国封建制度的安全阀的作用。相反，日本能够在16年之间推翻德川幕府，其动力正来自领地封建制度。对于比较分析现代化的原有制约力来说，这一观点十分重要。第三是日本的封建幕藩体制与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之间的差异。在日本，天皇与将军构成了二元政治体制；而在中国，中央集权制是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的、拥有绝对政治权威的制度。这种政治上的差异对两国封建制度的延续是有影响的。第四，上述的原有制约力导致两国调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上的差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的挑战，日本采取自我全面改革社会的方式来对应，中国则采取流动性调整政策。很显然，全方位改革是更为有效的调整机制。第五点是日本与中国对待文化传统特别是外来文化态度上的差异。日本是具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国家，很早就开始汲取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认为外来文化比本国文化水平高的观念长时期主导着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日本相反，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一向是封闭的和排斥的。

简而言之，《日中现代化比较》一书对于两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原有制约力特别是对于土地所有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的分析是成功的。但是，仅有这些分析还不能充分说明原有制约力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笔者认为，还有一些必须加以研究的重要的原有制约力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的家族制度。具体来说，是指与传统的家族制度中的家长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财产继承制度、祖先崇拜问题以及与土地所有制度相关

的“成就观”问题。

这里，我们仅探讨一下与土地所有制相关的成就观问题。在中国，商人一旦积蓄了钱财就收买土地，商业资本很少向制造业投资。在中国人的成就观念中，拥有更多的土地，跻身于地主豪绅或士大夫之列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发展现代化以前具有代表性的成就观念。与此相比，日本在幕藩体制时代的确也有“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度，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但是，商人既使十分富裕，也没有向土地投资而成为地主的想法。

除了土地制度以外，还有许多不能忽视的影响中国现代化方向的要素。如整个社会交往手段不发达、法治与秩序的关系、自然村层次的法律与国家层次的法律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构成制约现代化进程要素的价值体系、家族-亲族体系、阶层结构、法治习惯和学问传统等，还有待于今后深入探讨。《日中现代化比较》一书中提到的原有制约力，也需要今后继续深入地综合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课题是对中国1949年解放以后约40年间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研究，特别是对1978年以后10年来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解放以前存在的原有制约力量在解放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是没有变化？解放以后的政治改革是否对原有社会状况带来了冲击？受到冲击的原有社会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是没有变化？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主导的变动取向与以技术和经济为主导的变动过程是如何相互交叉影响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探讨。实质上，现代化过程研究就是社会变动研究。

笔者在结束全文之前想再次强调指出，研究现代化问题，最重要是阐明原有制约力与工业化冲击力的相互关系。仅仅对现代化作一般性说明无助于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必须详细研究诸如中国洋务运动和在日本殖产兴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工部省所起的作用一类的具体问题，而且要研究其社会背景、原有制约力、革新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力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我认为，把日本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时期与中国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作一比较研究，是对于日中双方都很重要的和具有实践性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不仅会对中国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某种启示，而且将对威勒提出的包括问题类型学说和对策学说在内的“现代化检索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现代化理论研究不应片面地集中在现代化终极范型这一点上。我们反复强调，不仅要研究终极模式，而且要分别研究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去孤立地研究每一个社会。我们在具体研究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还要进行比较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同时使研究成果带有普遍性，有必要运用笔者的“社会变动图式”和威勒的“现代化检索学”。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正是我们日中社会学者今后进行学术交流的基本目标。

李国庆译 张 萍校  
责任编辑：王 颀